

宁波帮系列丛书

宁波帮·正氣篇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帮·正气篇 /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034-3215-6

I. ①宁… II. ①宁… III. ①商业史-宁波市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1586 号

责任编辑:韩怡宁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录 排: 宁波宏涛工作室

印 装: 宁波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字数:200 千字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前 言

商帮与正气,在一般人的传统观念看来,似乎关系不大。对处于“四民”(士、农、工、商)之末的商人,许多人印象中向来是“无商不奸”,他们的身上,哪里会有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人们曾无数次地引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用以批评商人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殊不知司马迁说这话,并不是专指商人。他紧接着又指出:“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也就是说,连王侯将相这些达官贵人尚且害怕贫穷,那么草野民间的老百姓包括最末等的商人们追求财富,又有什么可以厚非呢?!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前还有一段话: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这段话的意思是: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义与气节;衣食丰富了,人民才会知道光荣与耻辱;“礼义”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推行仁义道德;小人富有了,也会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这好比潭渊深广了,鱼就多了;山林茂密了,野兽就多了;而人民富足了,自然会重视仁义、弘扬正气。就此话而言,司马迁比孔子更了不起。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小人跟“礼义”是不搭界的。司马迁则强调无论君子小人，富有了都会重视礼义，差别只在于能力大小而已。而且他对“利”看得特别重，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指出：讲仁义、扬正气，“没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由此可见，商帮与正气，其实关系匪浅。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开始崛起的近代中国，工商人士成为新兴阶层的时候，会凭借其雄厚的财力，推动礼仪之邦弘扬民族正气。而这方面的典型范例，正是宁波商帮，诚如司马迁所预言的，当他们的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之后，每逢重大事件，常常尽其所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许多人都认同孟子所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气质。中国人就是靠这样的精神气质，千百年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学大师钱穆讲过，“一部四千年中国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中国史，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故使中国屡仆屡起，屹然常在”。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经历了百年屈辱。西方用坚船利炮侵略中国，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了通商口岸、协定关税、自由贸易、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特别是攫取单向的治外法权：不受当地司法、行政的管辖，拥有领事裁判权；免除捐税、服役等。使其强占的租界成了“国中之国”，外国驻华使馆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外国侨民在治外法权这一“政治保护伞”的遮盖下，可以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治外法权的存在，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侵犯国权、商权与人权，变成了牢牢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政治枷锁。

最早开埠的宁波与上海，自然首当其冲。但是“威武不能屈”的

宁波人民，素有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抗倭、抗英、抗法，每次战争都是前仆后继、奋不顾身。随着宁波帮在上海工商界势力的日益增强，他们积极参与上海社会政治活动，在一些涉及洋人、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事件中，敢于率先表态、带头发难，为伸张正义而团结互助、抵御外侮。

当法国殖民者在1873年、1898年连续两次强占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四明公所制造血案的时候，旅沪宁波人万众一心、团结反抗，终于“民气压倒洋气”，高卢雄鸡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表示今后永不侵占。在上海租界内，当1904年俄国水兵砍杀甬籍木工周生友的时候，当1924年荷兰籍巡捕强奸宁波人胡吴氏的时候，当1925年“五卅”惨案中也有2个宁波人死难的时候，当1927年英国兵枪杀宁波人詹林来的时候，当1930年法国水兵殴打甬籍船夫忻丁昌致其落水溺亡的时候，具有较高人权意识的上海宁波帮每次都是强烈抗议，运用游行示威、媒体呼吁、罢工罢市等手段，反对租界制度下不平等的华洋关系，维护最基本的市民权。当1905年美国血腥排华并强迫清政府续签禁止华工的条约时，当同年12月上海英租界巡捕“大闹会审公堂”时，宁波帮并没有因为当事者非甬籍而袖手旁观，反而是冲锋在前，担当抗议运动的领导人，使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而当外商轮船在沪甬航线上骄横跋扈、欺压剥削的时候，旅沪宁绍帮毅然创办属于自己的宁绍商轮公司，对抗外商的经济侵略，成为“以华商名义，使用大型轮船，面对外国侵略者的强大竞争压力，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

与肆无忌惮地对华实施经济侵略的外商展开激烈竞争，振兴实业，挽回利权，可以说是宁波帮弘扬民族正气的主要表现。

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的“条约权利”和低关税，以最少的成本向中国输入商品，并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产品推销、原料收购和金融控制网，逐步控制了中国市场。列强的经济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造成中国近代社会落后和贫困的重要原因。但在客观上，西方列强用一种最残暴的方式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其中包括近代的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于是，最早经受欧风美雨洗礼的宁波帮，在反抗的同时向“强盗老师”学习仿效，自己开厂办企业，大力提倡国货，用以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相信，发展工商能够富国，富国就能御侮，富国就能兴邦。他们敢与外商试比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百折不挠地建民族企业，千方百计地创国货名牌。

宁波帮创办的民族企业，举其大者，有创造了近代中国许多印刷之盛的商务印书馆；有我国第一家自纺、自织、自染、自印、自销的毛巾联合企业三友实业社；有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企业、产品击败日本货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有打破依赖外国原料加工西药的禁锢、产品走出国门屡获殊荣的民族“西药王国”五洲大药房；有打败瑞典、日本的火柴并且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火柴市场、远销南洋各地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有打破西方垄断、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民族照明企业亚浦尔电器公司；有打破西方垄断、中国第一家制造氧气和乙炔的民族企业中国工业炼气公司；有打破西方垄断、在中国最早制造无线电通信设备与仪器仪表的民族企业大华科学仪器公司……宁波帮制造的国货名牌，举其迄今仍在生产者，有近代中国第一个与外商打官司并使日本仁丹败诉的“龙虎”牌人丹；有在1926年荣获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金质奖章的“飞虎”牌油漆；有

击败日本“美女”牌味の素的“佛手”牌味精；有打破西方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双钱”牌轮胎；有自己设计制造并能抗衡外国货的“三五”牌时钟；有国内第一品牌、出口美英法德澳等国的“白熊”牌薄荷脑等。这些企业和产品，都是在与外国同行的“商战”中历经艰辛后崭露头角的，弘扬了民族精神。

宁波帮弘扬民族正气，还表现在以推翻数千年封建帝制为目标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从中小商人到工商巨子，从家族财团到旅外侨商，宁波帮大都持同情与支持的态度，不少人直接投身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顺乎历史潮流，积极推波助澜，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尤其是上海与宁波的光复，出钱出力。如赵氏兄弟家蕃与家艺的慷慨捐献；如李氏兄弟云书、薇庄，特别是征五的身先士卒；如虞洽卿为江苏独立、南京克复屡建奇功；又如“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的美谈和“卢成章单骑克宁波”的民谣……他们的事迹闪烁着传奇色彩，看不出私心贪欲，却不乏浩然之气。

在近代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最凶恶的侵略者。“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步步紧逼，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达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巅峰。战争期间，日军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毁灭民族经济，实行殖民统治，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上海宁波帮极为关心民族经济发展的命运，同时也忧心国家民族的兴亡。他们发起提倡国货、发展民族经济为宗旨的中国国货运动。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信念的社会实践，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场爱国运动。他们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同仇敌忾，甚至毁家纾难，坚决支持抗日救亡；本着社会责任和人道精神，共赴

国难，自发开展大规模难民救助和支援前线工作，甚至横眉冷对敌人威胁、视死如归、慷慨赴义。其事迹可歌可泣、义薄云天，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阅读“抗日救亡义薄天”这一章，想必会强烈地感受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凛然正气。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宁波帮中还有一些中共秘密党员，以经商为手段战斗在绝密的第三线机构——广大华行，负责“与魔鬼打交道”搜集秘密情报，为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同志建立交通安全线；同时也是党在国统区内的经济支柱、地下党组织经营企业最成功的典范。广大华行的领导人，正是“阿拉宁波人”卢绪章、舒自清。站在同一条秘密战线上的，还有民族保险业的拓荒者胡咏骐、红色保险掌门人谢寿天。他们为党和人民立下了无法替代同时也无法宣扬的卓著功勋，更为宁波帮的正气篇书写了最亮丽的一页。而当蒋介石发动内战、大搞独裁的时候，面对这内战与和平、独裁与民主、黑暗与光明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也有一批宁波帮知名人士挺身而出，正气凛然，发出了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强烈心声。盛丕华、包达三、黄延芳、张纲伯，他们不仅亲历了“下关惨案”，还秘密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4月15日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邀请他们到香山双清别墅聚餐座谈。他们真诚地为解放上海、使这个全国的经济中心顺利回到人民手中建言献策。5月10日，毛泽东致电解放浙江的将领，指出：“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显然，这份电报与毛泽东和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等宁波帮人士的零距离接触、听取他们的建言献策密切相关。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最集中

的城市,做好上海工商金融业者的工作意义重大,毛泽东正是对宁波帮的能量与能力已经有所了解,才会作出这样的指示。

中华民族精神核心,就是爱国主义。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启航港之一的宁波,自古以来就有无数甬商漂洋过海,到异邦他乡去做生意,足迹遍履日韩、南洋、欧美各地。但是,不管走得多么遥远、不管有了多高身价,他们永远眷恋着故乡、挚爱着祖国。抗战胜利后,当盛丕华、包达三、董延芳他们积极投身反内战、反独裁、开新宇的斗争时,另有一批宁波帮人士,因为担心战争造成市面萧条、企业倒闭,也因为不甚了解中国共产党而选择了移师海外,大多前往香港、澳门、台湾,有的则以港澳台为跳板,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但是,他们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永远爱国爱乡、热心造福桑梓,并且青出于蓝胜于蓝,谱写了更加壮丽的新篇章。对于海外宁波帮王宽诚、邵逸夫、曹光彪、李达三,为表彰他们多年来致力于祖国经济建设和科教事业的发展,致力于为祖国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所作的重大贡献,纪念并褒扬他们热爱祖国、关爱人类的明德卓行,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提名,经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批准,在浩瀚的宇宙、璀璨的星空中,出现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当然,宁波人民也不会忘记自称“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我愿帮助宁波跑腿”的世界船王包玉刚,他的贡献也和小行星一样彪炳史册。还有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澳门首任立法会主席曹其真,他们为祖国统一而作出的努力同样是永垂青史。

在“一·二八”事变中慷慨赴义的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项松茂,曾为自己立下并实践了这样的人生格言:“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委命;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其实,这也可

以看作宁波商帮对于“正气”的理解,对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诠释。所以,宁波商帮中固然不乏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甚至助纣为虐的人与事,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一股“浩然正气”始终不绝如潮,推动宁波帮与时俱进,为国为民有所作为,至今仍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目 录

前言	(1)
一、团结互助御外侮	(3)
血染的风采 四明公所	(4)
维护市民权 珍惜生命	(18)
抗议的浪潮 民族尊严	(32)
团结的凯歌 沪甬航线	(44)
二、民族实业挽利权	(61)
建民族企业 从无到有	(62)
创国货名牌 从弱到强	(97)
三、辛亥革命功劳著	(119)
光复大上海 全力以赴	(120)
易帜宁波城 一马当先	(135)
四、抗日救亡义薄天	(149)
九一八事变 同仇敌忾	(150)

一二八事变	首当其冲	(153)
国货掀高潮	抵制日货	(164)
八一三事变	救助难民	(175)
西进大后方	发展经济	(184)
五、迎接解放开新宇		(197)
绝密第三线	广大华行	(197)
和平反内战	下关事件	(219)
共建新中国	肝胆相照	(229)
六、爱国爱乡谱新篇		(247)
率先垂典范	“王宽诚星”	(248)
伟哉包玉刚	“宁波大使”	(259)
兴国需科教	“邵逸夫星”	(272)
爱心献桑梓	奖教助学	(283)
祖国要统一	历史使命	(298)
后记		(307)

团结互助御外侮

一、团结互助御外侮

宁波人多地少,生存的环境比较窄小,清代康乾盛世之后,出现了“人口爆炸”,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而上海与宁波,一苇可航,交通便捷,所以从甬江横渡杭州湾到黄浦江畔的宁波人特别多,尤其是在清季末年,“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①估计要占上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常言道人多势众,当时旅沪宁波商人已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②其势力已遍及上海各主要行业,特别在金融、商业、航运、工业诸领域更是举足轻重。

鸦片战争及其《南京条约》,使宁波与上海同时被迫对外开放,开始沦为中国最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列强运用坚船利炮,发动侵略战争,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了通商口岸、协定关税、自由贸易、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特别是攫取单向的治外法权:不受当地司法、行政的管辖,拥有领事裁判权;免除捐税、服役等。使其强占的租界成了“国中之国”,外国驻华使馆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外国侨民在治外法权这一“政治保护伞”的遮盖下,可以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治外法权的存在,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侵犯国权、商权与人权,变成了牢牢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政治枷锁。

^①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3页。

^②上海文史馆等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02页。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宁波人民素有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光荣传统,抗倭、抗英、抗法,每次战争都是前仆后继、奋不顾身。随着宁波帮在上海工商界势力的日益增强,他们积极参与上海社会政治活动,在一些涉及洋人、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事件中,敢于率先表态、带头发难,为伸张正义而团结互助、抵御外侮。

血染的风采 四明公所

清代在上海谋生的宁波帮,他们大都是学徒工匠、负贩帮佣,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朝不保夕,但却都有敦重乡谊、团结互助、齐心协力、共御风险的传统美德。为了互相支持、互相照应、互相周恤、



上海四明公所门楼

互通信息,清嘉庆二年(1797),由钱随、费元圭、潘凤占等人发起“一文愿捐”,号召旅沪甬人“日输一钱”,筹建公所。这是谁都承担得起的,而且人多力量大,次年就以募捐得款购入上海县城北郊土地 30 余亩,建立丙舍和坟地;1803 年又建成关帝庙,并正式成立公所,因宁波有四明山而命名为“四明公所”。从此,岁时节令,同乡之人,无论关系亲疏、熟识与否、所操何业,语同音,食同风,拜乡土神,演地方戏,思亲之情,乡愁之苦,可于此得到慰藉;同时,也可凭借依赖这力量,防范异乡人、地头蛇的欺凌,尤其是抵御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的侵占、掠夺。

1849 年,法国殖民者在上海开辟租界,四明公所地块被划入法租界。1862 年,四明公所禀告法国驻沪总领事并呈报法国大使,要求四明义冢地“永远不准更动”,得到批准。1868 年,同治皇帝又下旨通知法租界公董局,“豁免四明公所墓地一切捐税”,给予印照,勘立址石。这在法国殖民者看来,无疑如骨鲠在喉,很不舒服,即使不能霸占,也必欲毁坏而后快。

1873 年,法租界公董局决议新建宁波路与西贡路,在设计路线时,故意定为从四明公所墓地横穿而过。四明公所闻讯,全体董事于 12 月 26 日联名上书法国总领事,要求阻止开路,略谓:“四明公所义冢,为贫苦在沪身故、一时无力回籍者设,如贵国之有台基坟地也。……今被其穿冢筑路,无论马车震动、朽骨难堪,即行履所经,亦非所以保全善举。若谓起棺改葬,则与毗连之同仁辅元堂义冢情节不同。盖彼等类多路毙等棺,向无领主,各省不一,本无可考,不妨随地迁葬。公所义冢则皆四明之人,非亲族即朋友,凡有子孙,日后皆须领归,且年久棺多,其中朽败者有之,设一一播迁、无人辨认,他日棺主来领,何以交代?且亦有负责国各前宪仁慈保全